

劉永佑 著

中國官文化的奠基者與批判家 ——孔子與毛澤東

山東人民出版社

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 ——孔子与毛泽东

刘永佶 著

1450/34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济南

0038

鲁新登字 01 号

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
——孔子与毛泽东

刘永佶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泰山新华印刷厂莱芜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9—01638—4

D. 422 定价：12.00 元

序

官文化，这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探索得出的一个范畴。它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的思想基础，又是由官僚政治所推广并维护的意识形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作用于我们祖先的思想和行为，残存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观念中。官文化是中国特有的，它曾促进过古代中国的发展，又是近、现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

孔丘和毛泽东是在中国四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个人，而他们二人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还在于中国文化的骨架，即官文化上。孔子为其奠基，2500年后的毛泽东则对之进行全面批判，并以民主文化来取代它。中国现在正处于政治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从文化角度说，仍是毛泽东所开创的批判官文化，建设民主文化的阶段。对于官文化，我们仍有继续认识和批判的必要。这正是政治大变革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官文化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在孔丘那里奠基，并由秦始皇、刘邦及以后各代帝王将相、儒学宗师们承继并发扬。悠悠两千多年，官文化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广泛、全面的作用，它有着深厚的基础和

丰富的内容。它曾经是历史上中国走在当时的现代化前列的必要条件，它又在近 200 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成为今天的现代化的后进者的主要因素。批判和消除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和必要内容。而这，恰由毛泽东以他毕生的精力和思想，来倡导，来实践，来发动人民群众以行动所从事了的。

我曾两次去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第一次是在 1966 年 10 月，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我们几个中学生，随着“大串联”的洪流，来到这块“圣地”。在这里，我和数以十万计的崇拜者，排队瞻仰毛泽东的故居，人流匆匆，几乎来不及细看，就被后面的人群挤出来了。这次留给我的的是激奋，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和崇拜。后来，我常回忆起那时的情形，总有许多疑问：是什么力量唤起了人们如此的激情？为什么会对毛泽东有如此的敬仰和崇拜？第二次是在 1986 年的 6 月，我到长沙参加一本书提纲的论证，抽空与两位同行专程去的。第一次去韶山，是站在部队的敞篷汽车上；时过 20 年，则是坐一辆外国进口的小车。20 年前，路上车流不断，如今，则清静得很。到清水塘前下车，我们很是仔细地观看了毛泽东故居的各个细节，并从容地照像，甚至到毛泽东父母的坟前转了转。

时隔 20 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1986 年，是毛泽东在中国受到冷遇的时候。我也是以冷静并已成熟的心思，来联想 20 年前的那些疑问。人的情感和思绪是如此奇妙，我在韶山解不开的谜，到曲阜，却有了一种

顿悟的感觉。

我是1988年夏天，随着一次会议，到曲阜——孔丘的故乡参观的。孔庙、孔林、孔府，这里的高墙大厦，精美的装修和富丽的家什，尤其是“大成殿”的龙柱，使我想到了北京的故宫和清西陵。再看孔丘坟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石碑，我立即有了一个“!”式的结论：孔丘是官，是一个跨越两千余年，历经各朝各代的“永恒性”的官。其地位虽低于皇帝，但他的声望、作用，却高于所有的帝王。

看着这人世间最大的官府，又想到韶山冲清水塘后面的茅草屋顶和泥土抹的墙。那道地的几间“寒舍”里所透出的浓烈的农家气息，与孔府中这高宅深院里弥漫着的酸腐气相比，宛如两重天地。在毛泽东的故居，我感到自然，感到亲切，感到自身的价值；而在孔丘的故里，我却感到了封建统治的威严，感到压抑，感到似乎被关在牢狱。我突然想到两个字：“民”与“官”。对，从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诞生地，我们所能体会到的巨大差异，就在这两个字的区别上。

毛泽东是“民”的化身，而孔丘则是“官”的代表。这同时也就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最为集中，最为抽象的体现，也是这两位文化巨人思想体系的实质区别之所在。

我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当我将方法论的研究告一段落，并着手专门探讨中国的特殊经济规律之前，曾用一段时间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我将它称作

“劳动的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是真正的、从人的本质（其核心是劳动）出发的人道主义。^①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中，贯穿并突出地表现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而孔丘，他的学说可谓他那个时代最为“人道”的，他本人反复强调并解说的“仁”，恰是他的“人道”的体现。但与马克思和毛泽东相比，孔丘的“人道”，是“官”的人道，是一种宗法的、伦理的封建主义。而这一点，又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实质所在。毛泽东所代表的，是中国亿万个被“官”管，被“官”治的“民”的利益和意识，而当他将这种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时，也就获得了现代的、先进的意义，从而也就为中国的现代化，开创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以民主政治取代官僚政治，以民主文化取代官文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来写这本书的。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旭茂同志，在这个题目上与我有相通的认识，我只是在长春《资本论》学术讨论会上，偶尔说到这个话题，他就紧追不舍，促我写下来。这大概就是“助产士”的作用吧，而他，在本书的编辑中，也为它的降生，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

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问题，可能是读者朋友都在思

^①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真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学说的原则》一书，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考的。受自己的学识、方法、条件的限制，我只是提出了问题，并谈了自己粗浅的看法，不尽言处，读者当会自思自想。我更诚心欢迎对本书的批评。

刘永佶

1994年9月

目 录

序.....	(1)
引论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巴黎公社原则”说起	(1)
一、神秘而深厚的中国官文化.....	(3)
二、马克思交给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论	(8)
三、官文化的形成及其作用	(12)
四、中国要现代化，必须批判官文化	(19)
五、“巴黎公社原则”——中国民主政治 的方向	(21)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史上两巨人	(28)
一、社会大变革的产儿	(30)
二、一样的执着追求，目标正相反	(35)
三、读书、教书、育人	(40)
四、文明史上承前启后者	(49)
第二章 孔子——官文化的奠基者	(58)
一、“礼崩乐坏”与“复礼”	(58)
二、君权与官制	(64)
三、天命观——官文化的世界观	(71)
四、“仁学”与“仁政”	(80)
五、求官与为政	(88)
六、私立“管理干部学院”	(96)

七、名义忠恕信 知勇利禄德	(104)
八、中庸之道	(119)
九、孟、荀的贡献	(128)
十、道统两千年	(132)
十一、官以载儒，儒以运官	(142)
第三章 官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骨架	(148)
一、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大贡献	(149)
二、治人与“人治”	(154)
三、“儒表法里”与“德刑相配”	(160)
四、“人与天地参”与君臣民的协同	(166)
五、环环相扣的官僚系统	(171)
六、“学而优则仕”与科举制度	(183)
七、“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190)
八、官本位与官至尚	(197)
九、“厚黑教主”的发现：求官与做官的 “真言”	(204)
十、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10)
十一、做官发财——官权与私利的统一	(216)
十二、民族和社会机体上的癌	(224)
十三、对商品经济的阻碍	(228)
十四、官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制约和污染	(234)
十五、社会革命的主要对象	(240)
第四章 毛泽东——官文化的批判家	(246)
一、现代中国文化的代表	(246)
二、孙中山——陈独秀——鲁迅——毛泽东	(251)
三、“改造中国与世界”	(263)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69)
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	(276)
六、“造反有理”	(284)
七、斗争哲学	(289)
八、阶级分析	(295)
九、人民民主	(300)
十、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	(306)
十一、以“民”自居的最大的“官”	(312)
十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318)
十三、千秋功过，历史评说	(327)
十四、“毛泽东热”——民主法制的呼唤	(333)
第五章 官文化批判与中国现代化	(341)
一、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341)
二、民主政治与民主文化	(347)
三、无产阶级民主和专政	(353)
四、官文化批判的意义和方法	(359)
五、官文化的消除与民主文化建设	(365)
结束语 再过两千年，回头看	(371)

引 论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巴黎公社原则” 说 起

人类文明史上，曾有过许多关于自然界的谜，远的不说，仅就现代人们普遍议论的就有：百慕大之谜，飞碟之谜，黑洞之谜，经络之谜，等等。这些谜，也就是人类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只知其现象而未揭示其本质使之成谜。破谜解惑，是人类文明前进的途径。

对于自然之谜，人们不仅愿意承认，还更愿意以自己的智慧去探索。可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也有许多谜，也需要以人类的智慧去探索。对此，似乎就不那么被人普遍感兴趣了，解谜的价值也就显得并不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社会中人，总以为对自己的生活最有发言权，也都是最“明白”、“看破红尘”的人。因而，当你把某个社会问题作为一个谜而提出时，往往人们会以自己的“独到”见解，不承认它是谜。

可是，正是众多的社会生活之谜，妨碍着社会的进步，妨碍着文明的发展。只有不断地破谜解惑，人类才能前进。

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中国官文化，就是诸多社会之谜中的一个。对于官，我们中国人可谓司空见惯，不仅现实中比比皆是，就是历史和文学作品中，也处处皆有。官怎么会成为一种文化，官文化又怎样成为一个谜呢？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资格对官发表见解。或许你本人就是某个级别的官，或许你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同学，就是一个官，顶不济，你是被官所领导着的。不妨就官这个题目搞个有奖征答，保证人人都有一套答案，也保证所有的答案不会雷同。

可是，又有谁能破解官这种文化形态的谜呢？仅仅谁个都敢承认自己对官有解答的能力这一点，就是一个谜，它又加重了中国官文化的谜的色彩。

我也是众多中国老百姓中的一员，并自作主张读了若干本关于官的书，曾一度以为解开了官之谜。但当我进一步去研究经济，去分析社会时，却又发现，中国的官及其文化，对我还是一个大谜。于是，我又转回头，再对它做更多的猜测和探索，想出了众多答案，也试着用某种西方现代政治学说（可谓“新式武器”）去解释它，但总不能满意。现在之所以写这部小书，是在我又再三再四地从历史到现实的探索中，也即从被我视作官文化奠基者的孔子，到官文化的现代批判家毛泽东这一历史时期中，有关的思想和史实的考察所得出的一些大纲式见解，交给读者朋友。

官僚政治是中国的发明，它是以孔丘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在两千余年的历史行程中，官僚政治不仅以其特有的功能使中国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也因其独特而封闭性的结构而使中国停滞不前。正是明清两朝，中国的官僚政治达到最为系统和成熟，恰在此时，中国文明开始衰落。而曾视中国官僚政治为学习楷模的欧洲诸国，在根据其自己的特点而批判吸收官僚政治中的某些机制后，却日益兴盛，并在其资本经济的洪流中，向中国扩张。官僚政治两千余年的全面统制，产生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官文化。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不仅在历史上居支配地位，还在现实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人的意识和价值观等方面，起着相当

大的作用。推而广之，当今世界诸国，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以否定的形式，包括了中国的官文化的某些机制和要素。就象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这四大发明依然以其特有的形式，对现代科学技术起着作用一样，中国人在历史上发明的官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是必须充分认识的。

研究中国的官文化，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促进我们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批判官文化，由此促进我们的政治改革。这一点，几乎是每个理智的中国人都能意识到的。

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大变革过程中，由毛泽东开创的这一伟大事业，尚需现代和以后若干代人的努力。这一历史变革，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我们以什么来指导这一工程？具体到政治改革，也就是以什么来指导对官文化的批判，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我认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学说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原则，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为此，我们的话题，也就从马克思有关的两个命题，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巴黎公社原则”谈起。

一、神秘而深厚的中国官文化

我时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什么，它存在于哪里？虽然总会做出一些定义式的回答，但几乎每次都不尽满意，又几乎每次都有新意。而当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我周围的人，他们的反应却又几乎相同，先是以为我的问题不值一答，甚至不成问题：中国不就在这里么，你本人就是中国人，怎么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知道了？但当我再将此问题复述后，他们看见我不是在开玩笑，于是

也去思考,却又大都觉得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或者从地理位置、民族、历史、社会制度、人口等诸多方面来回答,也都觉得不准确、不全面。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想到黑格尔的一句格言:“熟知并非真知”。关于中国是什么及其存在的问题^①,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熟知不过的,但对它的理性思考,却往往被忽略了。相比之下,那些认真研究问题的外国人,却因他们不是中国人,而要考虑,并从他们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几乎所有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都对中国的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定义。这里,我先引两段荷兰学者高罗佩的话,他于1961年出版了一部《中国古代的性生活》(中文名为《中国古代房内考》),该书的结束部分,作者这样写道:

每当人们从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研究中国问题时,都会对两个突出特点感到震惊:中华民族惊人的恢复力和中国文化的强大内聚力。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人们一再看到,异族局部或全部占领下的中国或四分五裂的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恢复了过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又变成具有同一文化的、统一的独立国家。这一现象使外国观察者颇感惊异,但却从不会使中国人惊奇,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②

其他的伟大文明均已衰亡,而中国的文明却依然存在;其他的种族均已消失、流散或失去政治上的认同,而中国却生存下来,不断繁衍,在种族与政治上可以认同。^③

高罗佩特殊的外国人的眼光,使他成为研究中国性史的第一位学者,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眼光,使他说出了上面关于中国文化的话语。这是相当精辟的,就象他笔下的狄仁杰(高氏是一位

① 对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逐层分析。

②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1页。

③ 同上书,第442页。

功力深厚的汉学者，他译了许多中国著作，其中《狄公案》及其续作，使狄仁杰这位唐代官员在西方获得“中国的福尔摩斯”之称)是非常精明和干练一样。

高罗佩所注意到的中国的这一特点，早在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就有许多思想家注意到，并开始探讨。由马可·波罗游记的刊行，所激发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哥伦布的远航是以寻找中国为初衷的，而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到中国的传教活动，打开了中国的文明之窗。法国的启蒙学者曾以效法中国的政治制度为其活动的重要内容，而英国则以其雄厚的资本势力为后盾，率先冲进中国大门，这些野蛮的、受资本增殖欲望驱使的侵略者们，在掠劫财富的同时，又注意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以思辨功能而自恃的德国思想家，如莱布尼茨和黑格尔，都曾以自己的方式，并根据自己的观念，对中国做出评判。黑格尔说：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①

黑格尔的思辨之光，远未照亮他头脑中关于中国的迷惑，《历史哲学》及《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中国的论述，是相当肤浅的，他只是将很少的材料织成不象样子的网。但就是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黑格尔是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之谜来看待的。而这个谜在黑格尔及其以后的时代，是对西方思想家们的一大困惑。而当英国及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并大肆收集和抢劫中国的文物和史料后，西方学者才有条件更深一层地解破他们关于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60～161 页。

中国的谜。马克斯·韦伯、罗素、汤因比等人，在对中国的论述中，已经将官僚政治作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支点。随之而来的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探讨，也都涉及了中国的官僚政治。透过这些西方人以其特有的民族优越感而做出的关于中国政治的评价，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官僚政治及其文化形态的认识，还不可能超出“外在”这个大范围。外在的观察与以外国的现代政治制度为依据的对中国官僚政治的评价，远未能揭示中国官文化的玄奥，而这些西方学者在其论述中，也不时表现出其神秘感。

西方学者对中国官文化的神秘感，是必然的。中国学者身临其境，自然不会对“本是我家事”的官僚政治和官文化有神秘感。可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出“熟知并非真知”。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功名利禄都交给官僚政治，他们或凭门阀势力，或以万贯家财作后盾，或寒窗苦读，科举、进士、做官。成为官僚极其雄厚的后备军，并且以其活动，形成和影响了社会性的官文化。若从个人角度说，他们倍尝酸甜苦辣咸，对于官僚政治和官文化，都有切身体验。可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受官文化的牵引，并由此而碌碌终生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应对它进行分析和批判。即令那些因仕途失意或科举受挫者，虽可发出动人心扉的感慨，但也没有从个别中概括一般。而这种感慨，恰又往往加重了官文化的玄奥性。某些文人，曾写出许多文艺作品，以揭露官场的黑暗，以及“官人”们的种种行状，诸如《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等巨著，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可也只是现象的描写，并无理论的概括。

对于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官文化是一种“天经地义”，不论为官还是不为官的知识分子，都陷入官文化的迷阵之中。即使是那些吏部尚书，也只是凭惯例行事，谁也未想到应对此做系